

全球文明互鉴视域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价值重构研究

——基于“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

常晨晨

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湖北武汉

【摘要】在全球化深度演进与文明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中华文化主体性重构成为实现文化自信与文明互鉴的关键命题。本研究聚焦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文化主体性面临的文明传承创新的现实困境，以“第二个结合”为理论指导，搭建“自主性—延续性—创新性”三位一体的理论支撑框架，构建“筛选—解码—转译—再生”的价值重构模型，通过文化基因筛选机制论证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中华文化主体性重构的可行性。“第二个结合”为中华文化主体性重构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支撑，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度互释。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价值重构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既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选择，也是推动世界各国文明互鉴，更是构建新型国际文化关系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文明互鉴；文化基因；价值重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22ZDA006）；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拉布里奥拉唯物史观研究”（X22S0029）；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项目（2025JYXM24）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5 年 9 月 19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10 月 15 日 **【DOI】**10.12208/j.ssr.20250387

Research on the valu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civilizational exchange—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based on the “Second Combination”

Chenchen Chang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eepening globalization and intensifying civilizational conflicts,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has become a key issue in realiz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facilitating mutual civilizations exchanges.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faced by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the global context. Guided by the “Second Combination,” it constructs a trinity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utonomy-continuity-innovation” and develops a value reconstruction model of “screening-decoding-translating-regenerating.” Through a cultural DNA screening mechanism, it demonstrates the feasibility of reconstructing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socialist culture. The “Second Combination” provides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rom Marxism for this reconstruction, enabling a profound mutual interpretation between Marxism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valu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offers both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a practical path for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ulture in the new era. It serves as a strategic choice for safeguarding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promoting mutual civilizations exchanges worldwide, and fostering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

【Keywords】 Cultural subjectivity; Second combination; Mutual civilizations exchanges; Cultural DNA; Value re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常晨晨，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大学岳麓学院访问学者。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与文明冲突论泛起的当代世界，文化主体性问题成为关乎民族文化生存与文明未来走向的核心命题。一方面，西方文化霸权不断消解非西方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后现代化国家陷入“文化失语”与“自我矮化”等本土文化价值认同危机的困境。在此背景下，传统中华文化如何重构并成为具有自主性与影响力的文化主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根基，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文明互鉴的必然要求。习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命题为此提供了理论突破口。这一结合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化，更是中华文化主体性重构的方法论创新，其本质在于通过理论的双向阐释实现文化价值的创造性转化与全球性表达。本文围绕全球化文明互鉴与中华文化主体性重构两大命题，遵循“问题导向—理论建构—实践路径”的逻辑框架展开研究：首先，聚焦于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文化主体性面临的现实挑战，从“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创新视角出发，阐明其价值内核；其次，构建系统分析框架阐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双向互动为跨文明对话建立了理论桥梁；最后，为破解传承困境、重构全球坐标到建设文化强国提出具体的实践方案。本研究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的双重探索，旨在回答“如何在文化全球化中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这一时代课题，为构建多元共生、文明互鉴的新型国际文化关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1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主体性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华文化主体性面临西方文化霸权与本土文化迷失的双重困境。“第二个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突破了单一文化主导的思维定式，开创了文明互鉴的新范式。面对全球化的价值博弈，中华文化主体性亟需超越传统惯性，在自主性、延续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中重构其内涵。

1.2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主体性危机

当前，世界全球化进程以资本、技术和信息的流动重构了世界文化版图，也在深层次上动摇了非西方文化的主体性根基。西方文化凭借其经济霸权、媒介优势和话语主导，通过文化商品输出、教育体系渗透和消费主义扩张，形成了对全球文化生态的系统性支配。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陷入文化认同焦虑与价值迷失的双重困境：既难以抵御西方文化的同质化压力，又在传统与现代的撕裂中丧失了文化创新的自主性。这种主体性危机不仅威胁民族文化生存，更凸

显了全球文化治理体系中权力失衡的深层矛盾。

西方文化霸权通过结构性优势实现对非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殖民。在经济全球化中，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快餐文化等文化产品成为资本扩张的载体，其背后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不断挤压本土文化空间。例如，美国迪士尼动画片在全球市场的垄断地位，不仅输出娱乐产品，更通过英雄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塑造全球青年的文化想象。此外，西方教育体系和文化机构通过政治教材输出、学术话语霸权，使许多国家在知识生产中被迫依附在被包装成真理的普世价值之上。这种文化霸权的消解机制还体现在数字媒介时代的技术垄断上，互联网平台算法推荐、社交媒体传播模式等均由西方科技公司主导，导致非西方文化内容在流量分配中被边缘化。例如，TikTok 虽为全球用户提供多元文化表达空间，但其底层技术和内容审核标准仍受制于美国资本逻辑，隐含着文化霸权的新形态。

另外，发展中国家在追赶现代化的过程中自我迷失，往往陷入“文化工具理性”的误区，认为传统文化阻碍了它们的进步，盲目追求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导致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断裂。例如，中国曾经历“全盘西化”思潮的冲击，儒家伦理、传统节日等文化符号被贬斥为封建残余，造成代际文化认同的断层。“恐怕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之前，即使在国内，不仅‘全盘西化’论总会有一定市场，希望中国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也总会有人欣赏。”^[1]这种自我否定不仅削弱了民族文化凝聚力，还使全社会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危机。更深层的矛盾在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理性崇拜加剧了文化价值的工具化，城市景观的同质化、消费文化的泛滥以及教育体系对传统文化的忽视，使得文化逐渐沦为经济发展的附庸。例如，中国传统节日在商业化浪潮中被简化为购物节，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失去其伦理教化和精神凝聚的功能，文化符号沦为资本增值的工具，这种异化现象揭示了文化主体性危机的实质——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夹缝中，文化失去了自主性与超越性维度。

文化主体性危机的核心表现之一是全球文化治理中话语权的缺失。当前国际文化传播格局呈现“西强东弱”的单向流动特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的话语权仍被西方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难以有效参与文化规则的制定。例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中国虽然申报成功的项目数量居首，但文化价值

的阐释权仍然受制于西方学术框架，未能充分彰显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这种话语权缺失的根源在于对文化阐释权的占有地位。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将文化差异视为零和博弈的工具，而普世价值话语则通过将其自身变为文化标准泛化人类共识，掩盖文化霸权的实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华文化强调“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但在全球化传播中缺乏与之匹配的阐释体系与传播策略，导致其价值理念未能有效转化为全球公共话语。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为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但其哲学内涵与实践路径只有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框架，才能被广泛接受。

诸如此类，危机的背后反映了文化主体性重构的必要性，揭示了全球化时代文化主体性困境的三重逻辑：权力结构的依附——受制于西方文化霸权；价值认同的内耗——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文化阐释的孤独——全球话语权的缺失。要突破这一困境，必须重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存逻辑。首先，文化主体性的重构需要打破二元对立思维，既要坚持对自身文化基因的自信，也要以开放姿态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其次，文化主体性的重构需要以“第二个结合”为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的实践性与批判性，中华文明注重“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二者的结合能够超越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的极端，构建兼具自主性与包容性的文化主体性框架。最后，文化主体性的重构需要在政治层面保障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主导权、在社会层面培育代际文化认同、在技术层面推动数字媒介的本土化创新，建立多维度的实践路径。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守护文明根脉、激活传统文化，并为构建多元共生的文明新秩序提供支撑。

1.3 “第二个结合”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需要，导引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变化交融的新视角。”^[2]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的升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内涵新的突破。1956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问题，“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正确方针，才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3](62)}“应当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各自都有着

事物自然呈现的自发的一种状态，也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就能够发生的历史过程，而是创造主体在积极顺应时代潮流变化的基础上，进行自主选择和主动创新之后所产生的结果。”^{[4](9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第二个结合”，则是在全球文明冲突加剧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探索，具有突破性意义。

首先，“第二个结合”是哲学基础的深化，马克思主义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这二者的结合突破了机械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桎梏，形成了更具包容性与生命力的世界观。例如，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融合。其次，“第二个结合”是文明互鉴的新范式，它主张马克思主义不是取代传统文化的“救世主”，而是激活传统文化的密码，这一理论创新为全球文明对话提供了新思路。最后，“第二个结合”是方法论的创新，它既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归，也不是用马克思主义“裁剪”传统文化，而是在批判与继承中，实现两者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双向赋能。

在创新维度的拓展中，“第二个结合”构建起立体化的理论体系，其核心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深度融合，形成多维度协同创新。在价值层面，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实现历史性对话，而脱贫攻坚与共同富裕政策的实施，彰显了这种融合对现实治理的深刻赋能。与此同时，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也发展为化解矛盾的社会治理智慧。在实践层面，这一理论推动制度设计与技术赋能的双重创新：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仁义礼智信”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使其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鲜活脚注；另一方面，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在全球治理层面，“第二个结合”以文明互鉴对抗文化霸权，倡导不同文明平等对话，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内核的中华文化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活动，塑造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新图景。由此可见，“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创新重构了全球文明逻辑。

在现实意义的深化层面，“第二个结合”为应对全球文化挑战提供了极具韧性的实践路径。“事实上，各国更多地使从自身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来决定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联合、中立抑或对抗。”^[5]在破解现代化困境方面，它以中国式现代化突破西方“殖民扩张—生态

掠夺”的现代化路径，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抵御文化霸权方面，它通过重构文化主体性，以非西方现代性叙事对抗西方个人中心主义。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中，“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与中华文化的“天下大同”理想熔铸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为破解文明冲突提供了现实的可行性路径。

因此，“第二个结合”重大命题的提出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关键路径，是对传统中华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理论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不断检验、完善，最终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明新形态。

1.4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涵重构需求

在理论层面重构中华文化主体性内涵，首要任务是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框架，通过双重路径重构文化本体论与价值坐标系。其一，从中华文化的哲学精髓中提炼普世价值，以突破欧洲启蒙理性的单一文明叙事，例如，“中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尤其体现在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上，”^{[3](31)}将儒家“大同社会”理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同时，通过创造性转化重释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价值，例如，将儒家“仁政”思想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逻辑，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启发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其二，在价值坐标系建构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论，整合“民本、和合”等传统核心价值，形成既立足本土又兼容世界的现代价值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历史叙事革新与文化遗产阐释强化文化自信根基，习总书记强调：“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6](312-314)}借助考古等实证研究重构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性，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从根本上破除文化自卑，确立中华文化作为人类文明重要源流的主体地位。

在实践层面重构中华文化主体性内涵，需要从文化创新机制与文化反制策略双维度推进系统性变革。在文化创新机制的构建中，通过跨界融合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利用 AI 技术赋能，实现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活化与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完善与文化创新基金的设立，对文化产业实行制度保障，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提供政策支持。在抵御文化霸权实践策略中，通过解构“文明冲突论”揭示

文化霸权的本质，文化领域的反制则依托媒介平台打造国际文化 IP（如《流浪地球》、《哪吒 2》等电影），打破好莱坞叙事垄断，借助短视频平台推动国风内容创作者重塑文化认同，这种实践路径为强化传统文化的时代适应性、制度创新性，以及为新时代的文化输出构建起抵御文化霸权的立体防线。

在全球层面重构中华文化主体性内涵，着力提升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能力，并重构文化霸权下的权力关系。众所周知，在参与全球文明对话时，习总书记提出了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包容性理念与原创性概念，推动了中华文化逻辑的全球阐释。在重构文化权力关系层面，以“一带一路”沿线孔子学院的建立传播中文、中医等传统中华文化，促成文明互鉴，倡导文明的平等对话，通过打破文化单向流动格局实现文化资源的共享性输出，消解文化输出等同于意识形态渗透的偏见，为建构新的世界秩序贡献中华文化的全球价值。

在应对现代化挑战中重构中华文化主体性内涵，需要聚焦于传统与现代的张力调和、伦理秩序的重塑及主体意识的培育三重维度。首先，通过重构现代性价值弥合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其次，重塑市场经济伦理体系，破解资本逻辑对人际关系的异化；最后，在培育主体意识层面，推动教育改革与公众参与双轨并进，培养全球视野的文化阐释者，激发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参与度，形成自下而上的主体性建构机制。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涵重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既要立足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又要直面现代性挑战与全球文化博弈的复杂语境，通过这种系统性重构，能够为应对现代化危机提供文化韧性的支撑，使中华文化在坚守主体性的同时，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多样性的重要力量，这一过程不仅关乎文化自信的确立，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的深刻回应。

2 中华文化主体性重构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型

中华文化主体性重构的理论体系以自主性、延续性、创新性为三维支点，通过“第二个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深度互鉴。这一重构的过程需要在理论上解码传统文化基因的政治适配性、技术传播性与代际传承性，更需要在实践上构建从符号解码到价值共识的系统性转化模型，兼具历史纵深与现实穿透力。由此，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双向阐释，从而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全球叙事权与文明话语权。

2.1 核心概念界定

在中华文化主体性重构的理论体系中，核心概念的界定构成理解其内涵与外延的基石。文化主体性被解构为自主性、延续性与创新性的三重维度：自主性体现为对文化解释权的动态掌控；延续性指向文化基因的历史传承与代际延续；创新性则聚焦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第二个结合”作为其理论指南，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双向互补，通过批判性继承实现传统文化价值的系统性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本质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自主发展能力、原创文化贡献及价值优先地位，而价值重构则是在“第二个结合”框架下，通过符号学解码、场景化转译及价值观再生，最终构建起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现代文化范式，为全球文明对话开辟了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新路径。

2.2 分析模型构建

在分析模型构建层面，文化基因筛选机制与价值重构的三阶段模型构成了中华文化主体性重构的双层实践框架。

文化基因筛选机制聚焦于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适应性筛选，形成多维协同的筛选矩阵。首先，政治筛选强调意识形态安全导向，通过确立文化资源的“政治正确性”边界，比如，对封建糟粕的剔除与对革命文化的保留，确保文化基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兼容性。其次，技术筛选注重数字媒介时代的适应性改造，借助区块链技术实现非遗技艺溯源，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重构历史场景，推动传统文化基因在技术语境下的再生。最后，社会筛选以代际认同为核心，通过教育政策引导，比如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和设计“国潮”文化节等社会活动，弥合青年群体与传统文化的认知鸿沟，实现文化基因的代际传递。

价值重构的三阶段模型遵循解码—互译—再生的动态循环逻辑。首先，在解码阶段采用符号学方法对传统文化基因进行系统性拆解，提取其核心符号与隐喻体系，比如，把“和而不同”中蕴含的多元共存智慧通过语义分析将其剥离出“三纲五常”等级观念的历史局限性，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结合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建立传统文化基因的数字图谱。其次，在转译阶段强调场景化的价值再造，转译的关键在于要建立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接口，将解码后的文化符号植入社会实践的场域，比如在乡村振兴中，将“耕读传家”的理念转化为生态农业观光模式；在国际传播中，以“二十四节气”为载体构建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体系。最后，在再生阶段，致力于价值共识的全球性文化重构，比如，

通过“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机制的制度设计，以及孔子学院全球网络的社会实践，推动文化价值的再生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对传统“大同社会”思想进行了现代转译，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伦理框架，实现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向全球公共价值的创造性转化。总体而言，这一模型的建立为揭示中华文化主体性重构的内在机理提供了可操作的阶段性路径。

2.3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双向阐释

通过历史的相遇与理论的互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实现了双向阐释，形成了独特的对话关系。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文明提供了现代性转型的方法论，中华文明则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本土化的生存智慧，这种理论的双向互动是文化主体性重构的核心动力，也是全球文明新形态生成的思想根基。

首先，这二者的双向阐释体现在哲学基础的融合上，通过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双重互鉴实现了互补性重构。其一，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人类社会规律，而中华文明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等哲学体系，构建了独特的宇宙观与实践观，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文明提供了现代性转型的科学方法论，实现了本体论的契合。这种本体论层面的融合，具体表现为唯物论与天道观的对话，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物质第一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气本论”，在生态观上形成历史性的呼应。习总书记提出的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对二者融合的创造性转化，既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核心要义，又以“斧斤以时入山林”的古老智慧重构了绿色发展理念。其二，方法论层面的深度契合，具体表现为实践理性与知行传统的共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强调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的哲学精髓相互激荡。这种同频共振在当代中国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脱贫攻坚中，党中央通过“精准扶贫”政策将抽象理论转化为精准施策的行动指南，在乡村振兴中，则以“乡土中国”的文化场域重塑现代基层治理逻辑，实现了传统“德法共治”智慧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融合。

其次，这二者通过双向赋能实现理论落地与文化调适的双重突破，完成了实践路径的创造性转化。习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6](315)}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具体实践对传统

文化实现了现代转化,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将“实事求是”从经学范畴升华为党的思想路线;在社会主义改革时期,邓小平同志以“小康社会”激活“大同社会”的当代价值。由此可见,这其中包含了对儒家思想精髓的创造性提炼,也遵循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原则重构文化基因。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被转化为国际关系准则,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底色。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本土调适则体现在社会结构的深层影响中,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逻辑,并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形成制度创新。这二者的双向互动实现了传统文化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适配,更通过具体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文明形态。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深度博弈中,二者的双向阐释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为破解文明冲突提供了新路径,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框架与新型国际关系。与此同时,尽管二者已形成独特的理论共生关系,但仍需警惕两种倾向。其一,机械教条化与文化复古主义的张力,若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万能药方”,可能消解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价值;反之,若陷入“文化复古主义”陷阱,则会弱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现实批判力。在实践中,这种失衡表现为,要么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模型而忽视本土社会实际、要么陷入文化符号的自我迷恋而丧失现代生命力。其二,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转译困境更加凸显,如何将“和而不同”等哲学概念转化为跨文化可理解的叙事体系,仍是文明互鉴的核心命题。“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文明发展进步,都不可能不受其他民族、国家文明成果的影响,都不可能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7]未来的双向阐释需要在动态平衡中稳步推进与不断前进,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作为分析工具,又要激活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智慧,以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也就是说,既要立足中国实践提炼文化共性价值,又要通过构建文明对话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这种理论的互动不仅关乎文化自信的重塑,更是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终极命题的回答。因此,我们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同时,要以开放姿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3 中华文化主体性重构的三维实践

中华文化主体性重构的三维实践需要围绕破解传承困境、重构全球坐标与建设文化强国战略体系三重

维度展开。也就是说,要通过创新性传承机制激活文化基因生命力,以文明互鉴重塑全球文化治理话语权,最终构建为破解单极化困境、推动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彰显文化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3.1 破解文化传承困境的实践方案

在破解文化传承困境的实践中,通过构建“技术赋能+制度保障+社会参与”的三维联动机制重构中华文化主体性,推动传统文化从“静态保存”向“活态传承”转型。具体而言,就是利用技术赋能,运用数字技术实现文化遗产的精准保护与创新表达。例如,运用AI修复敦煌壁画、虚拟现实重现盛唐气象、故宫博物院推出“数字文物库”让帝王画像“活”起来、非遗传承人借助直播平台开展技艺教学等诸如此类的传统文化活动,均体现了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的“活化”作用。在制度保障方面,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实施细则,“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明确不同文化事业单位的功能定位,为传统文化的创新提供新的空间。”^[8]设立专项扶持基金,支持青年群体参与非遗创新,通过政策推动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结合,使非遗项目实现产业转型和现实落地。在社会参与机制的建设方面,注重全民文化认同的价值培育,例如,在中小学增设国学经典课程与非遗实践课程、在社区举办主题活动重塑传统习俗记忆、通过故宫文创等项目的市场化运作将传统文化符号转化为大众文化消费热点。利用这样的实践活动,可以较好地解决传统文化因代际断层导致的失传风险,又通过创造性转化赋予其时代生命力,为中华文化主体性重构奠定坚实的基础。

3.2 重构全球文化治理的价值坐标

在重构全球文化治理的价值坐标过程中,中国需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为核心逻辑,通过多维度的价值重构推动全球文化治理体系向更均衡、更包容的方向转型。其一,以“天下一家”的中国传统哲学内核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打破“文明等级论”对国际关系的长期支配,为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议题提供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协作框架。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平台,中国推动了非遗保护公约的修订,倡导文化多样性保护,正是对单一文化霸权的直接回应。其二,构建多元对话的传播矩阵,依托数字技术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破传统文化困境。一方面,通过TikTok等平台打造新时代的文化叙事,利用短视频宣传东方美学的田园想象,使“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成为全球青年共鸣的符号;另一方面,建立“丝绸之路数字文化

长廊”等跨国项目,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还原敦煌莫高窟艺术,实现文化遗产的跨时空共享,这种技术赋能的叙事革新保留了文化的本真性,又创造了跨文化的理解性。其三,创新文化合作的制度设计,推动国际文化治理规则向更公平的方向演进。例如,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投行将文化包容性纳入基础设施投资评估体系,要求设立项目要尊重当地文化传统,又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中设立文化交流专项基金,资助中亚国家修复历史遗迹、共建博物馆,通过物质载体实现文明互鉴。“作为观念形态的人类文化,之所以具有‘共通性’的特性,其根据就内在于人类所具有的共同的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4](70)}这些文化实践已经突破了过去国际文化合作中经济附庸化的局限,构建起以文化平等为核心的新型合作模式,这一价值坐标的重构重塑了中国在全球文化治理中的话语权。

3.3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体系

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体系中,运用制度引领、创新驱动与全球赋能为核心框架重构中华文化主体性,构建覆盖文化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的现代化体系。第一,通过完善《文化产业促进法》、《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条例》等法规体系实现制度引领,确立文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与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为文化创新提供法治保障;同时,优化资源配置,设立国家文化发展基金支持非遗传承、虚拟现实主题公园等重大文化工程和新型文化业态孵化。第二,通过推动“传统文化+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推进创新驱动,推动文化科技深度融合,敦煌研究院利用AI修复壁画、新华社“数字记者”实现虚实交互等创新实践正是此融合的生动展示;另外,培育沉浸式演艺等新型文化业态,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链,以三星堆数字博物馆类的数字文博为例。第三,构建内容、技术与渠道一体化的国际传播与全球赋能体系,提升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依托短视频平台与“一带一路”建设,证明传统中华文化的全球市场潜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内推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数字文化长廊”深化文明互鉴机制。第四,筑牢文化自信的精神根基,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融入文艺创作与教育体系,在主旋律作品中例如《觉醒年代》、《长津湖》等通过艺术化表达实现主流价值的精准传播。同时,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建设,

使国学经典进课堂,实行生态文明乡村振兴模式等。这一战略体系的建设,旨在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过程中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难题,使中国在全球文明坐标系中从文化参与者转向价值引领者,实现了从文化资源供给到文化价值创造的质变跃升,促成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深度对话。

时至今日,中华文化主体性重构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涅槃重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文化工程,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文明参与者向文明提供者的历史性跨越与现代型转型,更表明中华民族以文明型国家的雄姿屹立于世界东方,从“文化大国”走向“文化强国”。当古老的东方文明基因在全球化时代与数字时代的浪潮中焕发新生,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交汇激荡,中华民族正以文化自信的磅礴之力重塑全球文明格局,人类文明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参考文献

- [1] 乔幼梅 历史的选择——五四、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1.
- [2] 王洪续,龙润霞 伟大的际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和交融[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 [3] 陈方刘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2.
- [4] 黎康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制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1.12.
- [5] 余碧平 文明的冲突和永久和平的理想——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铸》[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3
-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6.
- [7] 孙熙国,艾四林 2023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十讲[M].北京:研究出版社,2023.2.
- [8] 王志文,牛继舜 中华文化传播与传播策略研究[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7.4.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